


**重温  
红色延安故事**

# 陕甘宁边区高等检察处首任检察长——马定邦



● 马定邦(1908—1975)

## 走上革命的道路

陕北革命最早始于1923年夏，魏野畴、李子洲、呼延震东等革命先驱在陕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肤施（今延安市宝塔区）省立第四中学，与绥德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一样，也是较早建立共产党、团组织的学校。1925年夏，陈俞廷（1901—1929）大学毕业后，被中共北方区执委会派往陕北，在肤施省立第四中学任教。他以教书为掩护，同王超北、呼延震东、易厚庵一起，于秋季秘密建立了共青团肤施四中支部；1926年春夏，省立第四中学建立中共肤施特别支部。这是延安最早的中共地方组织。在共产党团组织的领导下，肤施省立第四中学学生中开展学生运动、建立起农民协会，唤起了穷苦大众的革命意识。王世泰、王树勋、焦维织等革命先驱早期也在肤施的省立四中学习、工作。

1908年农历十月初八，马定邦出生在延安市延川县贾家坪乡马家窑村一户农民家里。那里山大沟深，农民生活十分艰难。其父马奉君是个精明的庄稼人，虽然没有文化，

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马定邦出生的窑洞现在仍完好无损坐落在山腰。从古朴的院落和门楼牌匾上可以看到——光绪三十二年镌刻的“耕读传家”家训，显然这是一户重视教育的家庭。

其父马奉君老先生与邻村志同道合者出资办学，用优厚的待遇聘请老师，延川北源村的杨其敬老先生和田家川的田同清老先生，都是闻名乡里的先生，都在马家河当过教师。这所大山里的马家河小学，曾为陕北革命火种的传播作出过贡献。陕北早期革命烈士焦维织、马俊英，以及马定邦、石子珍、马国栋、石子珠、马万里等都曾先后就读这所学校，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们纷纷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马定邦考取了肤施省立第四中学。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他接受了革命思想，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经同学焦维织的介绍，于1926年加入青年团，1927年春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马定邦奉党的指派，回乡以教书为名，秘密开展“扩红”活动，他与早期共产党员马俊英等人在焦家河成立了秘密党支部，简称“定英支部”，扩大革命声势，壮大革命力量。先后任地方赤卫军大队政治委员、秀延县东区苏维埃政府秘书、中共秀延县委秘书等职务。

## 出任高等检察处首任检察长

1935年，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马定邦调任中央党校班主任、中共神府分区党校校长；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后，调到中共陕甘宁边区组织部和西北局组织部，任副部长、科长等职。

1941年1月21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正式设立，李木庵出任高等法院检察处首任检察长，刘福福为检察员。1942年1月，陕甘宁边区实行“精兵简政”，边区政府撤销了各级检察机关，检察处和各县检察员被一并裁撤，检察机关的职权根据案

情分别由保安机关（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代行，一般刑事案件统一由法院审理。

实施“简政整编”不久，李木庵、张曙时、何思敬、朱紫首次联名向边区参议会常委会提出恢复检察制度的提案；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也多次向边区政府提议恢复检察机关；到1945年12月，陕甘宁边区司法会议提出重新建立检察机关。

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指出：“必须健全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司法机关对法律负责，进行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地方行政的干涉。”

5月5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关于健全检察制度的决定，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改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马定邦继续任检察长职务，任命刘福福、折永年等为边区高等检察处检察员。

马定邦成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检察处首任检察长。

1946年7月23日至8月7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召开首届检察业务研讨会，由马定邦检察长策划并主持。高等法院马锡五院长、乔松山副院长参加指导了会议，各分区到会检察员有：绥德分区黑长荣、关中分区杨直、三边分区陈继光、陇东分区王生弟及关中分区书记员王磊葆等。会议历时14天，会议总结了以往检察工作经验，对此后检察工作的范围、组织机构、名称和各种工作制度进行了讨论研究。这是目前可查到的新中国成立前首次检察业务研讨会，说明陕甘宁边区检察机关已经开始重视检察业务建设。这次检察业务研讨会，不仅促进了边区检察业务素质的提

高，而且为建国后检察业务建设树立了典范，在现代中国检察制度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 陕甘宁边区时期首部关于 检察办案程序的法规——《陕甘宁边区暂行检察条例》

从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检察长，到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检察处检察长，马定邦检察长积极主动协助陕甘宁边区政府起草、修改法案、文书，他过硬的文字功底，赢得同志们的好评。1946年10月1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暂行检察条例》，对检察机关办理各类案件应遵循的程序作了详细规定。如传唤、拘提、调查、搜查、勘验等；关于宪法内所定人民权利、义务、经济财政及选举等违反事项；关于行政法内所定之惩罚事项；关于民事案件中之有关公益事项；关于协助自诉及担当自诉之程序等等，均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该《条例》规定的检察职权，显然已经大大突破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中关于检察员职权的规定。体现在：一是检察权从司法监督刑事犯罪的侦查、检举等拓展到了一般监督违反宪法、行政法规的违法行为的检举；二是检察独立与领导体制的确立。该《条例》规定：高等检察处受边区政府领导，独立行使检察权；实质上的审检分立。虽然高等检察处还设置在高等法院内，但法院领导已经对检察人员没有任何领导和指挥权力。由于检察权的拓展，所以对诉讼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进行了区别规定。

该《条例》是人民检察史上第一个关于检察制度的单行法规，规定了检察职权范围和行使职权的程序，填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检察办案程序方面立法的空白，相当于第一部“检察院组织法”。仅此，其意义在人民检察史上就不可低估，无论是关于

检察体制、职权、程序等制度性建构，还是一些具体措施的创设，都具有开创性，对新中国检察立法有较大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在检察体制上，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检察“垂直领导”权，即高等检察处检察长领导全边区各级检察员，受边区政府领导，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再受高等法院领导，实现了实质上的“审检分立”。

## 迈出“审检分立”的第一步

1946年11月1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健全检察制度的有关决定》，明确了各级检察机关的职权、组织及领导关系。规定“高等检察处受边区政府领导，独立行使职权”，“各分区设高等检察分处，各县市设检察处，均直接受高等检察处之领导”。随即，陕甘宁边区绥德等分区也成立了高等检察分处，边区部分县也配置了检察员。此项《决定》的出台，检察长马定邦功不可没。

这是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在陕甘宁边区第三次建立检察机关，这次建立的检察机关与以前的有很大不同：一是在检察体制上实行“审检分立”制，彻底改变了以前“审检合署”或“配置制”的做法；二是在领导关系上，直接受边区政府的领导，而不再受高等法院领导。这是新中国成立前首次建立的独立的检察组织系统，它标志着人民检察制度开始向独立体系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至此，检察机关的领导关系上确立了垂直领导体制，可以说陕甘宁边区成为人民检察体制发展和完善的实验地。

马定邦主持陕甘宁边区高等检察处工作期间，正式让人民检察制度迈出了“审检分立”的第一步。从此，陕甘宁边区检察体制从“审检合署”走向“审检分立”，为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由于边区高等检察处前后不足

半年，开展工作较少，部分检察分处只帮助分庭调查一些案情，独立侦查办案很少；加之战争环境，检察机关本质上没有真正实现单独建立。

马定邦先生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检察处工作期间，边区在检察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是整个陕甘宁边区法制建设的缩影，是那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时期，在中国检察制度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值得我们学习、探讨和研究。

1947年8月，马定邦调任绥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副主任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绥德分庭庭长、清涧县委书记；1948年7月南下黄龙，任中共黄龙地委常委、陕北区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1949年5月，调任中共陕北区区委委员、组织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马定邦历任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党校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处长，中共中央财贸部兼中央、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共中央财贸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八大”代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1973年8月回乡接受劳动锻炼。1974年春节前回京。1975年5月31日病逝于北京，享年67岁，骨灰放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纪念馆里。马文瑞为马定邦的去世题写了挽词：“马定邦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忠诚地奋斗一生，永远值得后人怀念。”

2021年，陕西省检察机关开展“寻访革命旧址、保护革命文物、传承革命精神”专项活动，延安市检察院和延川县检察院发现陕甘宁边区高等检察处检察长马定邦故居未采取保护措施，存在安全隐患，向延川县文旅局和贾家坪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并跟进检察建议落实。随即，延川县有关部门秉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对故居的院落、窑洞等进行了维修，目前正式将马定邦故居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作者为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检察院 田雨生）



## 永坪会师旧址

永坪会师旧址位于延安市延川县永坪镇，现已建设成永坪镇小学操场，竖立有标志牌。

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下，到达延川县永坪镇。9月16日，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抵达永坪镇，与二十五军会师。会后，9月17日，中共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在永坪西北军政干部学校教室（现延川县永坪镇小学）主持召开中共西北工委中共鄂豫陕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

## 历史事件：永坪会师始末

1935年夏，中央红军打破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向陕北转移。蒋介石为在红军主力到达陕北之前，绞杀全国仅存的这块革命根据地，接连两次调集重兵，“围剿”西北革命根据地。8月，开始对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西北苏区军民在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和刘志丹的领导下，奋力反击国民党军队的猖狂进攻。正值此时，由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突围的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下，挥师北上，9月15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今永坪镇）。当日，永坪大路旁边张贴着“欢迎二十五军老大哥！”“消灭晋军！消灭高桂滋！”“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等标语。西北党政军机关干部和当地赤卫军、少先队，列队赶到永坪西南欢迎红二十五军到来。9月16日，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主力，从

丹、高长久、聂洪钧、徐海东、郭述申、郭洪涛、程子华、慕生忠、慕纯农、戴季英等组成，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秘书长李静波，组织部部长王达成，宣传部部长郭述申，白区工作部部长慕生忠，妇女部部长白茜，政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中共陕甘晋省委下辖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神府工委和县委，李景林任陕甘边区特委书记，张晨钟为神府工委书记。改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聂洪涛，秘书长范子文，参谋长戴季英，供给部长白如冰；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兼），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辖3个师，红二十五军整编为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后叛变），政委赵林（波）（后叛变），参谋长毕士梯，辖第二三二团、第二四四团、第二五五团；红二十六军整编为七十八师，师长杨森（后田守尧），政委张明先（后脱离革命，改由张达志任），辖第二三二团、第二三四团、骑兵团；红二十七军整编为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后崔田民），参谋长任浪花，辖第二四二团、第二四三团。全军团7000余人。

## 延伸阅读：永坪会师

1935年9月的一天早上，雾特别大，相隔十来步远就看不见人。但是，永坪镇附近的红军和老乡，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涌到永坪镇的河道上。因为今天，经过长途跋涉，冲破层层封锁，战胜了无数艰难困难，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整整整齐地排列着欢迎的人群。人群中，有红军部队，有红大学员、赤卫队员，也有妇女会、少先队、政府的干部、学校的学生和当地的老乡。三四道大彩门，矗立在道路中间。山沟和大道两旁的岩石上、树干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上边写着：“欢迎红二十五军老大哥！”“消灭

晋军！消灭高桂滋！”“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河沟草地上，许多孩子吹着小笛儿，用尖溜溜的小嗓子唱着：“打倒反动派，打倒国民党，男女都平等，人人闹革命，大人娃娃一条心，革命早成功……”歌声、笛声，合着人们的欢笑，荡漾在晴朗的天空。一会，一位指挥员，骑着一匹枣红马，来到部队前面。他勒马向大家问道：“准备好了吗？”大家齐声答道：“准备好了！”他又继续说道：“红二十五军跋山涉水，受尽千辛万苦，来到咱们陕北，马上就要和我们会师了！招待客人，本来应当拿出些礼物，可咱们这里的政权刚刚建立，又受着敌人的封锁，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我们却有着火热的心，我们一定要热情地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正说着，后沟里跑来两匹战马，队伍里马上吵吵嚷嚷地议论起来：“交通员回来了！”“一定是红十五军来到了！”……果然两个交通员在马上气喘喘地大声向指挥员报告说：“二十五军到了！正在前边庄上整理队伍。”指挥员听了，两腿夹紧马肚，掉回马头，打了一个响鞭，喊了声“老大哥来了！准备欢迎！”带着两个交通员便奔向前庄去了。队伍里顿时热闹起来，“立正！”“立正！”“向右看齐！”“向右看齐！”……口令声此起彼伏。庄头上出现了一样迎风招展的红旗，后边是黑压压看不到头的队伍。立刻，河面上响起了锣鼓声、歌声和口号声。正在田里干活的乡亲们，听到锣鼓声，也打着锄头跑来了。徐海东同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身材高大结实，穿着一身青色军装，八角形的军帽上，还钉着一颗红五星。他一边走，一边笑着挥手向我们问好。紧跟在首长们后面的是骑兵警卫排，再后边是手枪团。手枪团大多数同志都穿着黑军装，腰里缠着“九龙袋”，每人背着一把盒子枪和几颗手榴弹，身后还斜插着一把大刀。他们排成四路纵队，整齐地走了过去。我们一个劲地喊口号、唱歌。他们一个个神采奕奕，笑容满面，也唱着歌来回答我们。手枪团的后面是80来个人组成

的司号连，吹打得哇哇响。再后面是几十个十五岁没有化妆的宣传员，又唱又舞地走了过去。在一些抬着伤员的担架过去以后，战斗部队过来了。先是二二二团。嗬！一个连就有5挺轻机枪，每个营还有6挺重机枪。步兵分成三路纵队行进，都扛着一色的步枪，有的还上着明晃晃的刺刀。当中还夹杂着一些挑夫，竹扁担颤悠悠地闪动着。他们照样唱歌、喊口号，有时趁着换肩的机会，还连连朝我们招手。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称赞着。特别是对他们的武器装备，更感兴趣。凑巧这时二二二团刚走完，后边部队还没有来到，一个带红臂章的通信员走了过来。我们一下把他包围起来。有人问：“你们那一色的马枪步枪，都是咱红军工厂自己造的吧？”通信员指着我们一些赤卫军背的红臂章回答说：“不是的，我们原来扛的也和你们一样。现在的枪都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大家一听，便纷纷谈论起应该学习老大哥的艰苦、勇敢精神。谈着谈着，后面的部队又上来了。我们这才放走了通信员，又欢迎起后面的部队。一直把红十五军的同志送到了红大休息、欢迎的人才各自回家去。路上，我激动地想：高桂滋、阎锡山还梦想三个月消灭我们，哼！等着瞧吧！红十五军来了，我们的力量更大了，还不知道谁消灭谁呢？回到驻地，同志们也都顾不得吃饭，就凑在一起议论开了。这个说：“嘿，咱们老大哥的武器比‘大红鞋姑娘’的武器还要强好几倍。”那个说：“比阎老西（即阎锡山）的武器也强呵！”说得大家都高兴地哄笑起来。过了两天，我们跟红十五军互相进行参观访问活动。贫农会也把老大哥、小伙子、小媳妇都组织起来，带着绣花荷包、袜底等东西去慰问他们。到了驻地，男的帮战士们劈柴、打水，妇女就抢着洗衣服、补袜子。战士们也把打土豪得来的花布、丝线回赠给老乡。参观回来的路上，一个老大娘不断地数说着：“姑娘们，小小伙子！这回你们好好生产吧！‘红鞋队’、晋军，保险再不敢来了。”

第四天，是正式的联欢大会。陕北的红军部队、赤卫军都赶到永坪来了。在石油厂左边的河滩上搭了一个大台子，上面横挂着“欢迎红十五军”的标语，台子顶上插满了红旗。会场当中用石灰画了一条粗粗的白线，左边坐着红二十五军，右边坐着我们陕北红军。满场都飘荡着红旗，旗杆上的黄铜帽在太阳底下闪烁着金光，从高处望去，简直是一片旗海。两边的部队都有啦啦队，歌声和哄笑声，此起彼伏，真是热闹极了。会议开始了，徐海东同志讲了话。他对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根据地后，处处受到热烈欢迎，表示感谢。又说红二十五军不过是南方红军的一小部分，以后还要有大批红军到陕北来，另外也讲了一些沿途的战斗情况。接着是各部队和妇女会、赤卫军等团体的代表讲话。最后是刘志丹同志讲话。他穿着一身灰蓝色军装，腰上扎着根皮带，挎着支手枪，瘦瘦的个子，往台上一站说道：“我们陕北根据地还很年轻，敌人用尽了一切办法想消灭我们，可是他们并没有能够如愿。金松山（敌师长）被我们消灭了，又来了个高桂滋。高桂滋吹牛三个月要征服我们，三个月早过去了，我们没有被征服，而他自己眼看就要完蛋了。现在晋军、东北军又跟了上来，可是我们的红十五军也来了。我们的力量更强大，现在不是敌人追着打我们，而是轮到他们收拾他们的时候了。”接着他又说：“我们只要不断地壮大红军，根据地就能巩固。大家都看到了，红十五军的同志们带来了许多枪支，现在需要的是有更多的人来背它，谁愿意来背呀！”这一问，台底下的乡亲们轰动起来了，特别是那些小伙子们，他们大声地嚷道：“我愿背！”“我愿背！”当场就有许多人参加了红军。会后，各地都掀起了参军热潮，红军迅速地发展起来。不久，我们便在劳山消灭了敌人的一〇师，击毙了敌师长何立中。陕北根据地更加扩大和巩固了。

（供稿单位：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